

日本人权外交的强化及其困境

王广涛 俞佳儒

[内容提要] 自2020年以来,人权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讨论中备受重视。人权派议员团体以及执政党高层着力推动相关立法和制度准备。岸田文雄上台后不仅设置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还在外务省专门设置负责人权外交机构。在日本人权外交叙事中,通过人权外交补齐日本外交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其主观动因,而以人权问题为抓手配合美国开展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则是其外交战略布局的应有之意。日本所推行的人权外交不仅无视自身国内的人权问题,同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手段选择性地应用,以此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日本输入人权规范的双重标准以及输出人权外交的区别对待,显然已经偏离了普遍人权理念的轨道。

[关键词] 人权外交 人权规范 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

[作者介绍]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日本政治与外交、中日关系;俞佳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日本政治与外交、中日关系。

近一段时期以来,人权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讨论中备受重视。岸田文雄于2021年9月就任首相后对外高举人权外交大旗,并将其列为日本外交重点议题之一。2022年2月1日,日本众议院在中国农历春节通过涉华决议案,参议院则在同年12月5日通过决议案,对涉疆涉港等所谓人权问题表示关切。2023年5月19—21日,日本作为东道主举办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亦把人权问题纳入峰会议程中,并点名批评中国。人权并非西方国家对外政策领域的新鲜

议题,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冷战结束以来也曾在国际人权领域作过积极的尝试,但是如此高调“扛大旗、挑大梁”的行为却比较少见。本文在对近期日本人权外交实践进行评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动因以及所面临的内在悖论和困境。

日本强化人权外交的主要表现

冷战期间,日本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表现相对低调,对涉及他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亦有所保留。^①日本外交讨论中开始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始于冷战结束,1992年颁布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规定,在实施对外援助时应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基本人权保障等问题。近一段时期,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日本政府的人权外交无论在制度架构上还是实施路径上都有一系列突破。

第一,人权派议员团体活跃,积极推动人权立法进程。2021年4月6日,自民党籍议员中谷元和国民民主党籍议员山尾志樱里发起成立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该联盟成员以自民党、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议员为主,还吸纳了公明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NHK党和一些无党派议员,人数达83人。该联盟致力于为日本人权外交的顺利实现铺路,成立宗旨之一便是推动制定日本版的“马格尼茨基法”,为制裁外国人权侵害者提供法律依据。^②

除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以外,相关代表性涉华人权议员团体还有日本新疆国会议员联盟、日本西藏国会议员联盟、支援南蒙古国会

^① 参见David Arase, “Japanese Policy toward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Asia,” *Asian Survey*, Vol.33, No.10, 1993, pp.935-952; Watanabe Akio, “Japan’s Position on Human Rights in Asia,” in S. Javed Maswood ed., *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Routledge, 2001, pp.69-91; Yozo Yokota and Chiyuki Aoi, “Jap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Human Rights: Uncertain Changes,” in David P. Forsythe ed., *Human Rights and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15-145; [日]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人权、国家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82页。

^② 参见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官方网站: <https://jinken-gaikou.org/>。

议员联盟、对华政策国会议员联盟等。这些涉华人权议员团体的活动甚至早于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集中成立于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其中,对华政策国会议员联盟成立于2020年7月,该联盟最初就是以抨击香港国安法为目的而成立的。日本新疆国会议员联盟虽然成立于2012年,但活动已中断多年,至2020年11月起又日益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议员团体之间彼此合作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并形成合力向日本政府施压,推动涉外人权立法进程。2020年4月,支援南蒙古国会议员联盟成立时,在其他相关议员团体担任要职的中谷元、古屋圭司、下村博文出任该团体的顾问。中谷元不仅是对华政策国会议员联盟共同代表,也是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的发起者。2021年12月8日,涉及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人权外交四个议员团体与支持缅甸民主化超党派议员联盟举行共同会议,商讨在临时国会表决“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决议”的相关合作事宜。^①活跃在涉华人权问题领域的高市早苗及其背后的安倍晋三多次要求政府以人权问题为由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当年12月14日,高市早苗、下村博文和古屋圭司等议员以相关议员团体会长的名义拜访岸田文雄,共同要求政府以人权为由抵制北京冬奥会。^②2022年12月5日,以上述团体为基础的调查中国人权侵害行动议员联盟成立。2023年2月17日,对华政策各国议会联盟(IPAC)和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共同举办IPAC东京人权外交论坛,旨在为5月G7广岛峰会时人权问题造势。

第二,自民党内成立人权议题小组,推动政府出台相关人权政策。2021年2月,自民党下属外交部会成立人权外交项目小组。同年5月27日,项目小组发布政策建言报告,宣称人权外交是不可逆的世界潮流,关乎日本的国家利益;提出在重视传统对话与合作基本路线的同时,要做好进一步推进

① 「超党派5議連、採択働きかけへ 対中決議」、産経ニュース、2021年12月8日。

② 「北京五輪「外交ボイコットを」 議連が首相に要請」、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2月14日。

人权外交的准备。该报告明确了日本人权外交的基本方针、短期目标、中长期规划和体制强化方案等。其中,人权外交的基本方针包括:进一步明确人权是普遍价值的立场,强调人权外交不是干涉内政;积极推进人权外交;根据国际形势,推进与国民共同进步的人权外交。该建议还提出了10条短期目标,重点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准备、在商业和援助中评估人权状况、加强人权外交制度建设以及对国际人权平台的参与等。^①

2022年2月和6月,人权外交项目小组又陆续发布了第二份和第三份政策建言报告。第二份报告聚焦于商业与人权,重点提及了美国对于新疆产品的进口限制,要求日本政府在经济政策中充分考虑人权问题。^②第三份报告在商业与人权问题以外,还提出了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难民接收、提升民众人权意识等课题。^③2021年5月,自民党内外交部会负责人佐藤正久在《正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日本充分活用人权外交,并对日本在新疆、香港、西藏和内蒙古人权问题上的迟钝反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自民党内部过多关心经济而忽视人权问题,恐会遭到美国拜登政府和七国集团的孤立,不符合国家利益,要求日本重新开始进行真正的人权外交。^④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夕,佐藤正久再次发文呼吁日本在人权外交上展现更为果断的行动。虽然自民党内人权外交项目小组反复提及商业与人权,但是日本企业对于撤离中国的热情并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真正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无法从根本上重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第三,日本政府对内积极完善人权外交制度安排,对外通过多边机制强化人权外交存在感。岸田在2021年9月上台后即着手人权外交体制的建

① 「外交部 わが国の人権外交のあり方検討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第一次提言」、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2021年5月27日。

② 「わが国の人権外交のあり方検討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第二次提言～「ビジネスと人権」に関するわが国のあり方～」、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2022年2月8日。

③ 「外交部 わが国の人権外交のあり方検討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第三次提言」、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2022年6月7日。

④ 佐藤正久、「今こそ日本の人権外交復活を」、『正論』、2021年5月号、122-129頁。

设,新设国际人权问题担当首相辅佐官,并在外务省下设人权问题专门职位,集中处理人权议题。岸田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承诺设置有关负责国际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在第二次组阁时,岸田正式设置该职位,并任命始终活跃在人权问题上的中谷元出任这一职务。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岸田表示人权问题不仅仅是外务省的工作,同样是法务省的工作,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将与各省厅合作,从全局考虑人权问题。^①这一职务被认为是日本在人权问题上横跨省厅的“司令塔”。

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来强化其人权外交的存在感。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为例,自2006年6月第一届会议起到2020年2月第四十三届会议为止,日本派出参会的代表始终是外务大臣政务官。^②然而,自2021年起,为彰显对人权问题的重视,日本提高了参会代表的级别。时任外相茂木敏充参加了2021年举行的第四十六届会议,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中谷元自2022年起作为日方代表参会。此外,岸田政权还积极参加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2021年12月,岸田携中谷元出席首届“民主峰会”,岸田在发言中强调了日本尊重“普世价值”和“民主主义”、通过对话和合作改善人权等基本立场,并将设置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作为重要成果进行介绍。在2023年3月第二届“民主峰会”上,岸田重申“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并自称日本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发达民主国家,强调日本在民主和人权领域的责任与担当。G7同样是日本人权外交实践的重要平台。2023年5月20日,日本作为东道主在广岛举办G7峰会,在联合声明中多次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并以人权为幌子对中国的香港、新疆和西藏事务横加干涉。^③

① 「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21年11月10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1/1110kaiken.html。

② 其中有2009年和2012年两次例外,2009年第10届会议由驻日内瓦常驻代表出席,而2012年第19届会议则由外务副大臣出席。

③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06875.pdf>。

日本强化人权外交的动因

日本政府虽然高调宣称其人权外交的宗旨在于促进人权,但现实中的人权外交不外乎是一种外交政策手段,而外交的意涵在于实现契合本国国家利益的政治诉求。日本人权外交活跃的背后,有国家利益的驱使,也有国内、国际层面的驱动。

第一,以人权外交补齐日本外交短板。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7年颁布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虽然明确了保障基本人权等原则,但是在对外政策领域,日本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一直保持低姿态。冷战期间确立的“小规模、轻武装、经济优先”的“吉田路线”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在此背景下,日本并未将“民主”和“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随着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日本对外政策考虑的重要参照。在细谷雄一看来,人权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中缺失的部分,无论是外务省的相关组织架构,还是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人权的考量均不充分。^①

冷战结束后,已经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开始了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在国际人权领域亦出现不少新提法。例如,日本政府在冷战结束不久所提倡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理念,其目标就是想在国际人权领域发挥领导性作用。但是“9·11事件”后日本无条件追随美国,以及此后提出的“价值观外交”等主张,影响了其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公信力。安倍在第一个任期提出的“价值观外交”被视为日本人权外交的前奏,但这是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只是对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补充。安倍于2012年第二次上台执政后便逐渐放弃了这一提法,反而是想通过“新安保法案”等

^① 细谷雄一、「なぜ人権外交が重要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戦後日本外交の歴史から回顧する」、<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7501/>。

军事安全领域的突破来补全日本外交的短板。当军事安全领域实现既定目标后,安倍才开始在所谓的“价值”领域寻求新的尝试,其“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构想提出的背后便潜藏着“普世价值”的考量。日本此前有关“价值观外交”与“普世价值”等提法都显得过于笼统,但直到人权外交提出后,才开始以看得见、可操作的形式反映日本在价值观领域的诉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权外交是以“价值观外交”延伸出来的一种外交手段。

第二,以人权外交谋求日本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对于日本而言,疲软的经济使其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亚洲经济领头雁的角色。在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加强关注人权因素的背景下,日本需要紧跟步伐,展现自己人权“先进国”的身份,在人权等价值层面展现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优越地位。以安倍执政期间着力推动的“印太战略”为例,日本政府虽然宣称要建设“自由且开放的印太”,但其“印太战略”的前提是在“自由”前提下的“开放”,而“自由”的意涵则更多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在2023年3月20日访问印度期间,岸田文雄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计划作了详细的阐释,即特别强调要在“印太”地区营造尊重人权的投资环境以及建立相关的制度架构。^①

早在第一个首相任期,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便表示,日印两国作为“思维方式相同的民主海洋国家”,应把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联结起来,促进“更为广泛的亚洲的自由和繁荣”。^②另外,安倍第二次执政伊始就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发文,提出“亚洲民主安全钻石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构想。^③有关“钻石菱形”的构想最终在安倍执政后期以及继任的菅义伟和岸田文雄政权逐步发展成为机制

①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ための新たなプラン」(概要)、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77659.pdf>。

② 陈拯、王广涛:《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67页。

③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magazine/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化的“四国峰会”。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执政后期适逢美国特朗普执政,特朗普本人并不太关注人权问题,日本便抓住借人权外交彰显其特殊性的良机。

日本已经在安倍执政期间通过新安保系列法案,岸田执政期间又通过“安保三文件”,未来日本军费占GDP的比例可达到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可以说,为谋求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日本已经在“硬件”上作出了多重尝试。而在被视为“软件”的领域,人权外交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而中谷元等人权派政治家之所以致力于人权立法的目标便是在人权领域占据所谓“道义”制高点,推动日本发挥政治领导力并最终成为“人权大国”。

第三,配合美国以人权外交为抓手牵制中国。日本政府设置人权问题首相特别辅佐官以及在外务省设置专门人权机构,这些措施看似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其具体事务大多围绕中国展开。究其原因,除了日本政府单方面想要补齐短板并以人权为抓手实现政治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人权外交还是日本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抓手。2021年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对外主打“人权牌”,美国在连续发布年度人权报告的同时,还将人权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以及经贸投资等领域联系,这在对华战略竞争的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对此,日本采取了积极迎合美国的态度。2022年7月24日,日美经济版的“2+2”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日美两国在会谈中就商业和人权问题进行了磋商,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商业领域所面临的人权问题协调统一标准,而且未来两国有意将此标准适用到整个“印太”地区。2023年1月6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与美国商务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签署《关于促进供应链中的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工作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的要求,日美两国就相关法律、政策和指南交流信息;促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和工人组织的对话;并推

广人权最佳实践,以及内部认可的劳工权利尽职调查。^①《读卖新闻》分析指出,日美两国签署的备忘录旨在排除供应链中涉及人权侵害的企业,美国方面针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所谓“强制劳动等侵犯人权”等问题立法,希望通过这一具有约束力的备忘录将相关规制渗透至日本企业,并要求日本企业在赴华投资以及在涉及中国进口商品的供应链环节遵守“人权以及劳工标准”的规定。^②日美之间在经济、贸易以及投资领域所谓人权议题的合作,本质上是美国在打压中国的过程中,以人权为抓手拉拢日本入伙。

此外,中谷元作为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也同美国高层保持人权领域的热络对话。其在2022年1月26与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泽雅(Uzra Zeya)的会谈中表示,未来日本就人权问题将同美国深化协调,并推进各相关省厅机构的交流,同时就涉及可能侵害人权问题的出口产品进行管制。泽雅同时也是拜登政府任命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针对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日美两国的负责人亦有可能保持协商。^③

第四,日本国内舆论热炒人权话题,为相关团体和政客推动人权外交提供言论空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国内排外主义等涉嫌违反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引发国内较为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客观上带动了日本民众对人权问题的关注。2021年8月的一项有关日本舆论的调查显示,有近60%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间,因国内外的相关事件而提升了人权意识”。^④就对华人权外交而言,日本外务省2022年3月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寻求中国对人权、自由、民主主义和法治的尊重”是日本对华外交应该关注的重

①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on the Japan-U.S. Task Force on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in Supply Chains,”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1/20230107003/20230107003-1.pdf>.

② 「日米、供給網の人権促進で作業部会 サイバーでも協力強化」、Reuters、2023年1月7日。

③ 「人権問題で日米協力 中谷補佐官、米高官と会談」、産経ニュース、<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126-RY3DCZXJPRJJ5AYDY5NCDBTXU4/>。

④ 「この1年間で「人権問題への関心が高まった」6割弱 BIGLOBEが「人権とジェンダー平等に関する意識調査」第2弾を発表」、BIGLOBE、2021年10月15日。

点,在所有选项中排名第二。^①日本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议题设定主导涉及人权问题的舆论动向,另一方则以舆论动向为理由为其在人权领域的活动辩护。

日本国内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为政府对外推进人权外交提供了可能。对于左派而言,对所谓基本人权的尊重本就是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加之民众对人权问题和人权外交的关注,参与人权外交的造势活动便顺理成章。对于保守派而言,虽然人权问题并非其核心关怀,但是面对日本面临的所谓危机和国际环境的压力,人权外交便成为其实现目标的政治工具。从具有代表性的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来看,其人员构成横跨朝野,虽然由保守派主导,但也不乏自由派人士参与。其中,作为保守政党代表的执政党自民党有33人,而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则有17人。尽管人权外交远未在日本政党政策的层面达到完全一致,但“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相对广泛的参与性显示,日本社会对人权外交已有较高的认同。

日本人权外交的悖论与困境

日本在追求其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将人权外交视为重要议题,但从其目前所取得的效果来看,人权外交显然是一项错置的议题。虽然日本意图通过人权外交强化其与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关系,但是,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面对来自西方标准的人权规范,其人权外交难以避免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境。此外,其人权外交主张的背后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悖论。

第一,日本对来自西方的人权规范践行双重标准,对危及自身利益的人权规范采取拒绝态度。当前国际社会涉及人权的相关法案主要由西方国家推动,而相关人权规范的主体也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是日本并没有完全接受来自西方的人权规范。例如,西方各主要殖民国家以及二战侵略国相

^① 外務省「令和3年度 外交に関する国内世論調査報告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22年4月20日。

继对二战以及殖民统治期间侵犯人权的行为谢罪、反省以及寻求和解的尝试,而日本在历史问题的立场上一直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当前,“夫妻别姓”^①、移民难民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主流议题,而日本在这些领域似乎与西方主流国家存在错位。诸如夫妻别姓问题,日本一直持保留态度。日本国内反对夫妻别姓的逻辑在于,如果承认夫妻别姓,那么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将会崩溃,国家的基础或出现根本性动摇。^②也就是说,当西方的人权规范遭遇日本的传统规范之后,人权就会让位给传统。这些明显在国际社会被视为侵犯人权的议题,在日本国内却以传统为理由被束之高阁。2021年4月,就在日本国会反华议员积极拼凑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的同时,菅义伟内阁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在未穷尽所有安全处置手段、未与周边国家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径自决定将福岛核污水直排入海,一边鼓吹人权,一边践踏人权。核污水直排入海严重侵犯相关各国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粮食权,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未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另外,日本在接收国际难民、移民问题上,也与西方的人权规范存在明显的差距。日本是西方国家中接受移民、难民最为消极的国家。虽然有观点认为日本作为东方岛国,地理上不太容易接收较多的国际难民,但是更本质的原因则在于,日本认为国际难民、移民会对日本固有传统和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冲击。根据法务省的统计,2021年向日本政府申请难民的数量为2413人,而日本政府最终认定并接收的难民只有74人,难民认定率只有0.3%。同样来自法务省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17日,日本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数量仅为2185人。^③如果致力于建设人权大国,那么就应该在人权领域有担当,显然日本国内从民众到政府都没有形成这一共识。

① 指夫妻双方可以使用不同的姓氏。目前日本的婚姻制度规定在提出结婚申请时,必须有一方将姓氏更改为另一方的姓氏,但实际上大多数都选择妻随夫姓。

② 筒井清輝、『人権と国家——理念の力と国際政治の現実』、岩波新書、2022年、206頁。

③ 参见法务省网站: <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001373694.pdf>。

第二,日本国内人权事业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且面临着诸多严重的问题。针对当前日本正在积极推进的人权外交,有学者指出,日本通过人权外交追求引领性地位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日本也应该直视自身的人权问题。如果自身所面临的人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显然也很难在国际人权领域树立领导地位。^①岸田内阁虽然有意成立人权专门机构处理人权外交的问题,但日本国内并不存在针对国内人权问题的机构。而有着不少人权外交相关议员团体且热衷于通过人权外交相关决议的国会,在面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日本的相关审议时却往往用“检讨中”一词搪塞。^②

首先是日本的少数民族问题突出。以北海道为据点的阿依努民族,作为原住民族长期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在1986年访美时的演讲中,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刻意强调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同时还顺带贬低美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日本国内阿依努团体的抗议。直到2008年,日本政府才正式认定阿依努族为原住民族。根据北海道地方政府2017年进行的调查,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只有13118人,其中会使用阿依努语的仅0.7%。^③然而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府的各类人口普查以及经济情况调查数据表中并无有关阿依努民族的选项,以至政府至今仍难确定全国范围内阿依努族的人数。而且,针对阿伊努族的社会歧视也依然存在,有近30%的北海道阿伊努族人有过被歧视的经历。^④可见,日本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依然突出。

其次是近年经常发生针对外国人的人权迫害事件。其中,2021年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收容的斯里兰卡籍女性因故死亡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人权问题的关注;2023年1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日本的“入管问题”发

① 筒井清輝、『人権と国家——理念の力と国際政治の現実』、202頁。

② 馬橋憲男、『日本の人権状況に厳しい勧告——国連UPR審査』、『世界』2023年5月号、23-26頁。

③ 北海道環境生活部、『北海道アイヌ生活実態報告書』、2017年、3、49頁。

④ 北海道環境生活部、『北海道アイヌ生活実態報告書』、2017年、52頁。

出劝告并要求其改善人权问题。据统计,2007—2021年,仅仅在日本的收容设施中发生的死亡事件就高达16起,其中有5起系自杀事件,由此可见入管局收容设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另一严重的人权问题是技能实习生受迫害事件。日本以技能实习为由从海外招聘廉价劳动力,然而这些所谓的技能实习生大多只从事单纯体力劳动,并未从事技术劳动。企业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而招收技能实习生,这些技能实习生中遭遇克扣工资、没收护照、强制加班的案例不少。日本诸如此类的国内人权问题一直是灰色地带,而日本政府却从没有尝试过要作出调整。

第三,日本人权外交带有强烈的偏向性,往往以人权为借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在人权规范的对外运用方面,日本的人权外交似乎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国家,而是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对此斯坦福大学教授筒井清辉指出,在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急剧动摇的状况下,日本告别战后以来在人权领域的消极形象,尝试主导国际人权规范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但是,这种人权外交应该基于更普世的理念,同时应该对所有的国家人权问题提出主张,而不是仅仅针对特定的对象国,“如果日本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了批评,那么相同的问题如果发生在缅甸、伊朗甚至美国,日本也应该作出相应的批判”。^①然而,事实上日本政府很少对于美国等所谓自由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发表批评意见。

日本显然是在选择性地利用人权外交以实现对特定国家进行牵制的目标,近一段时期日本联合美国将人权问题纳入经济安全保障以及供应链转移等议题,本质上是将人权当作手段而非目标。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人权外交服务于日本的整体外交政策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理念。日本强化涉华人权领域的攻击,而这种攻击仅仅是日本对华牵制政策的一

^① 筒井清輝、『人権と国家——理念の力と国際政治の現実』、202頁。

环。除了人权议题之外,日本还以经济安全保障为理由尝试与中国脱钩,所以人权只是日本追求其国家利益的工具。^①第二,一般认为自由派人士更加重视人权,而在日本则主要由保守派人士牵头。更加吊诡的是,这些保守派人士在涉及本国人权的问题(诸如仇恨言论、男女平权等)上本就劣迹斑斑,其对外扛起人权外交的大旗的真实用意令人怀疑。

结语

2020年以来,日本的人权外交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其人权外交更多被赋予政治性,呈现出攻击性的色彩。这集中体现在涉华人权议题上,而这与近一段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积极推进的人权外交存在诸多局限性,抛开大国政治博弈的利益交换不谈,日本自身在人权规范的接受和普及上仍然处于“落后国”位置。尽管日本强调与G7国家在人权等议题上的一致立场,并且在G7峰会等场合以人权问题为由夹带私货、攻击中国,然而日本人权保障的国际水准在G7国家中处于最后一位。^②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46个排名国家中位居第116位。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基于宪法中的基本人权理念在国际社会中推动人权外交有其意义,但是人权外交不能成为对特定国家进行牵制的手段,同时也要改善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国内人权状况。^③日本输入人权规范时持双重标准以及输出人权外交时的区别对待,显然已经偏离了普遍人权理念的轨道。■

(责任编辑:吴兴佐)

① 木内登英、「中国の人権問題重視に舵を切る日本」、<https://www.nri.com/jp/knowledge/blog/1st/2021/fis/kiuchi/1221>。

② 「日本の人権状況は『後進国レベル』辻村みよ子さんが背景を解説」、朝日新聞デジタル、2023年2月1日。

③ 「(社説)日本の人権外交 普遍的価値掲げるなら」、『朝日新聞』、2021年11月18日。

Abstracts

A New Round of Arab–Israeli Reconciliation and Its Limit

Chen Shuangq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ahrain, Sudan and Morocco signed the Abraham Accords with Israel in 2020 to normalize relations. It further promotes and deepen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each other in various fields. The driving force of Arab–Israeli reconciliation mainly comes from strategic adjustments made by relevant parties such as Israel, some Arab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situation. Since January 2023, the extreme right-wing government of Israel has implemented a tough polic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has escalated, casting a shadow over the Arab–Israeli reconciliation.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Palestinian issue and th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Arab countries,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of Arab–Israeli relations faces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nd the road to comprehensive peace is still long and tortuous.

Keywords:

the Abraham Accord, Arab countries, Israel, Arab–Israeli reconciliation

EU's Different Responses to Refugee Crises and Its Prospects

Han Xiangzhi and Li Jingkun

Abstract:

The EU has suffered two large-scale refugee crises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responded in very different ways, with differences reflected in policy philosophy, efficiency of action and degree of engagement. The EU prioritized security concerns and sought to restrict refugee entry under the guise of combating illegal immigration in 2015. In 2022, the EU is emphasizing its welcome and support for refugees, working at record speed and taking a leadership role. The reason why the EU adopts different policies stems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core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ttitude of European society toward refugees determines the keynote of the EU's policy; member states' willingness to surrender sovereignty determines the EU's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determine the EU's willingness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the EU w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huge differences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insufficient system supply on the refugee issue. Possible breakthroughs are to face up to the demand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reform of the asylum system.

Keywords:

EU, refugee crisis, differentiated responses, 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

Japan'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Its Dilemma

Wang Guangtao and Yu Jiaru

Abstract:

Japan'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since 2020. Various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s focusing on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ruling party

have been pushing for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preparations for human rights diplomacy. Since Kishida's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a new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ime Minister in charge of human rights issues has been appointed, and a new agency in charge of human rights diplomacy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illing the gaps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through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seeking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the subjective motivations. In this process, Japan also tries to make use of human rights issues to coordin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However, Japan'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not only ignores its own domestic human rights problems, but also selectively applies it to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s a policy tool to constrain China. The double standards and differential attitudes in Japan'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have devi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Keyword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human rights norms, Japanese diplomac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Nordic States' China Policy Shift and Its Influence

Yan Xiaoxiao and Yu Jianhu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ordic countrie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have been more inclined to vigilance, prevention and confrontation, and their hostile attitud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ir China policy is a combination of engagement and confrontation. The policy adjustments include economic opposition to decoupling and prevention of dependence, political estrangement, increased security precautions, and intensified confrontation on human rights issues. This adjustment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policy is mainly due to subjective judgments and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system and the search for a larger sha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response to China's role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S-driven values camp and the pan-securitization of the China issue, and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China's position in the Ukraine cris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Nordic states, China policy, human rights diplomacy,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US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Judgement That China Is "Non-Market-Orientated"

Li Liwen and Jin Yucan

Abstract:

The term "non-market-oriented" is a common phrase used in joint statements issued by the US, EU and Japan, and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suppres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S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and some companies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a tripartite effort to create a high-pressure posture against China. The US labeling of China as "non-market-oriented" is a result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esire of the US Democratic Party and Republican Party to seek political gain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ight against unfair practices in US trade with China by defending its rights through legal means and expanding its circle of economic and trade friends.

Keywords:

"non market-oriented", trade competition, world trade system, Sino-US trade relations

US Sanctions on Chinese Technology Talents

Ma Xiaoxiao

Abstract:

Targeting Chinese STEM students and visiting scholars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